

新书馆

编者按

唐魏国夫人杨氏，曾在史书中留下色彩鲜明的一笔。而真实的她又应当是怎么样？本书以唐魏国夫人的唐代历史文本记录，及后世文本对魏国夫人的记载变化为依托，以魏国夫人的生命历程、日常生活为主线，比较全面地描述这一典型唐代贵族女性的生活状况，从而反映出唐代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后人唐时期魏国夫人描述变化的历史内核。

历史文本的建构与日常生活的呈现

——读李志生老师新作《唐魏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



李志生

郭海文 米佳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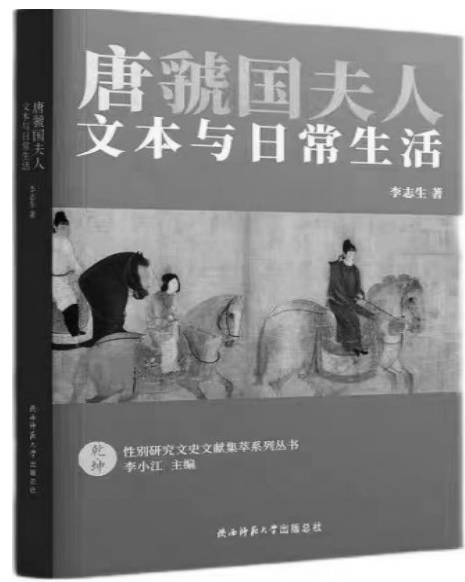
李志生老师是唐代历史及妇女史研究专家，她的专著《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及译著《闺塾师：清末江南的才女文化》是相关教学和科研的必读书。作为唐史研究专家，李老师熟悉西方新史学理论和性别理论，并将其恰如其分地运用到研究之中，毫无违和感。《唐魏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一书，即是她多年在唐代妇女史耕耘的成果，为著名学者李小江教授主编的“乾·坤”——性别研究文史文献集萃系列丛书第二批之首。笔者不揣浅陋，于此谈一下自己的读书心得。

唐魏国夫人，杨贵妃的姐姐，杨国忠的堂妹，唐玄宗的大姨子，正史无传。其史料散见于正史中杨贵妃、杨国忠等人的传记、历代诗人的词赋和《魏国夫人游春图》等图像里。她是红颜祸水还是政治的牺牲品？她为什么可以在唐玄宗面前素面朝天，又为什么三月初春时节她能骑马驰骋在长安水边？唐宋时期关于魏国夫人的文本与元明清时期的文本有什么不同？该书从问题入手，“追索历代文人特别是唐宋文人思想中‘真实’的魏国夫人及其成因”，并根据文本的衍进“将魏国夫人的‘历史’进行整合”，在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独具特色。大概有三个特点：

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史学理论相结合

李志生老师本硕博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是王兴先生的高足，受过传统治学方法的训练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熏陶，该书正是这种综合素质积淀的体现。

目录学是文献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代学者王鸣盛早有箴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明，方可



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史料齐备，方可做系统研究。李老师深谙目录学之精髓，采用其研究方法，尽其所能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这些史料涵盖了史子集三大部分，对后人了解学术源流和继续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校勘是文献学中的基本功。正如治史大家王鸣盛所说，“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李老师将“校勘学”的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之中，通过比较文本记载中的细微差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魏国夫人之死，李老师敏锐地发现，史书记载互有出入。首先，在两《唐书》中《杨贵妃传》的记载有所不同，《旧唐书》所记载魏国夫人之死更为血腥。其次，仅仅就在《旧唐书·杨国忠传》中魏国夫人之死也不同。一处是“为乱兵所杀”，一处是“自刎死”，“并未见其被俘至狱中受折磨而死的曲折情节”。再次，在《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载七月丙申”记载，魏国夫人“既未自刎，也未被俘，而是被县令诛杀”。对比之下，《旧唐书》中的记载无疑最为血腥。原因何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传统“女祸”观对历史书写的影响：“《旧唐书·杨贵妃传》所记的‘极致’死亡过程，或许只是史家表达的某种残忍快感，并非事实。而这种残忍快感，来自对安史之乱祸首之一的魏国夫人的愤怒。”不同时期的历史文本中留下了不同的时代印记。

西方史学理论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互为参照的认识工具。在李老师这里被运用得娴熟而到位。如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对本书的叙事语言就有直接影响。历史不可能复原，“人们只有通过‘想象’的方式，来使它再现于意识或话语之中。所以一切历史的再现，都不可避免地含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李老师将该理论渗透在写作中，着重分析了历代魏国夫人文本衍进的特点：“唐至宋是其史形成及细节出现的时期。元明清时期，则是另一主题——‘淡扫蛾眉’的发展时期……当然，两个时期也并非决然相隔，其间的文本内容也有若干交叉。”又如对性别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关注妇女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能动性（agency），侧重她们的自我感受（self-perception），这在魏国夫人的研究课题中，同样是一个需要更多揭示的重点”。传统叙事总将魏国夫人当作唐玄宗、杨国忠等男性主体的注脚，她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完全被忽视掉了。该书通过大量事例突出展现了魏国夫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如魏国夫人出行时“靓装盈里，不施帷帐”，李老师细致地分析了她冲破“男女有别”的藩篱有意“让别人看”的欲望，将她在历史文本中隐约呈现出来的主观意志“纳入复杂、多元的日常生活语境，以期获得‘三重动态模式’下的妇女生活样貌”。

文本与图像史料相结合

该书涉及的文本史料颇多：唐代18种、五代3种、宋代12种、金代1种、元代4种、明代2种、清代7种。李老师对各种史料熟练的掌控能力让人叹服。书中，除了以文本作为基础外，还大量使用图像史料，仅正文部分就有69幅，涉及人物、衣物、饮食、建筑、出行工具等诸多方面。这些图像并非只是好看的插图，而是用以研究问题的证据。其一，《唐木女俑及面部化妆临摹图》、莫高窟“唐女供养人”等唐代女子画像壁画，可以展现出唐代女子的精美妆容，与书中“唐朝女子讲究浓妆艳抹——如娇艳的牡丹花，这也正是其时女子雍容华贵之美的体现”相印证。其二，利用唐李德裕、贺若氏墓出土佩饰的图像论述唐代命妇礼服等级的差异，而这些考古实物正是唐《武德令》和《旧唐书·舆服志》等文献史料记载的唐代舆服等级制度的有力证据。其三，饮食文物的图像让我们得以一窥唐人食物、饮食器具的样貌，如对魏国夫人吃过的“透花糕”进行考证，书中不仅使用了《说文解字》《云仙杂录》《元和郡县志》等文本资料，还用到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

出土的唐朝花式糕点作为佐证。在考证魏国夫人使用的“水精”食器时，她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水晶八曲长杯图做补充说明。其四，书中的“唐代中上阶层住宅空间格局示意图”“唐住宅模型”等，清楚地呈现出唐代房屋的中门界限，便于读者理解古代女性“无故不出中门”的儒家性别理论。《唐长安城图》的使用，也辅助论证了魏国夫人抢夺韦嗣立宅的史实。其五，书中的《唐三彩牛车图》《魏国夫人游春图》《唐妇女乘輦图》《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等，不仅直观地展示了以魏国夫人为代表的唐代贵族女子各种出行工具，也再现出她们出行时的庞大阵仗和奢华生活。书中运用的图像史料将文本史料具象化，“使僵硬文字难以记载的历史场景清晰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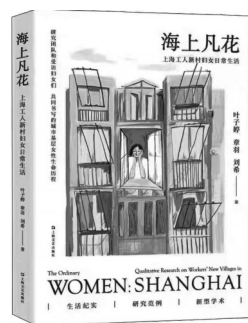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相结合

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所谓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将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是近年来学术界热点，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在“日常生活”名下，李老师特别重视“物”的考索，将“衣、食、住、行”分门别类，独立成章，呈现出活生生、有质感的历史画面。例如，书中，考证魏国夫人的“绣罗衣裳照暮春”，估算出一匹罗的价格约可购买一个成丁男子一年的口粮；考索杜甫《丽人行》中记载的紫驼之峰、素麟、八珍三种珍馐和翠金、水精盘、犀箸三种食器，展现魏国夫人饮食之豪奢；通过对魏国夫人在长安城和华清池的五处宅邸的位置、造价进行考述，李老师认为：“指出杨家外戚对居住等级的僭越，似并不特别突出……故所谓的‘僭拟’，更多指向的当是奢靡，即——宅多且修造奢华，魏国夫人的住宅就是如此等。”对《魏国夫人游春图》中的骏马及马鞍、马鞍、障泥等进行考证，展示出魏国夫人对“靓妆露面，无复障蔽”的妇女骑马出行时尚的追随……总之，该书以物质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具体的“物”来对日常生活进行纵深研究，无疑拉近了读者与魏国夫人的距离，展现了丰富又有活力的历史场景。

综上所述，《唐魏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是一部集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史学理论相结合、文本史料与图像史料相结合、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力作，对推进唐代妇女史的研究大有裨益。（郭海文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米佳鑫为该院博士生）

悦读

《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的日常生活》



叶子婷 章羽 刘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三位作者关注当代逐渐成为“草根社区”的工人新村的发展现状。她们带着性别视角，在4年里访谈了20多位上海市长宁区某工人新村的基层妇女，为她们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包括摄影工作坊、日记工作坊等。重点追踪了三对母女的生活状态，对她们开展了长期的口述历史访谈。这本书纪实与研究并重，以“互动互助”“研之情”的质性研究方法，在研究和分析之外运用口述史、日记等呈现这些研究对象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以及研究者自反性的田野经历。

《艺术：让人成为人》



(美)理查德·加纳罗 特利玛·C·阿特休勒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4月版

《艺术：让人成为人》为百人文库系列的一本科普书，被誉为“伟大的人文教科书”。内容涉及人文的方方面面。涵盖的文学学科有：文学、艺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等；深入讨论的人文主题有：信仰、幸福、死亡、道德、自然、自由和爱等。本书结构独特的人文研究导论，不仅揭示了一个充满创造力和智慧的世界，还提供了一个个条分缕析地回应这个世界的框架，同时也探讨了批判性思考者借以评价并反思其所读、所见及所闻的各种策略。书中文字晓畅明了，配图丰富生动，观点新颖，视角多元，范例充足，分析独到，整体内容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可读性极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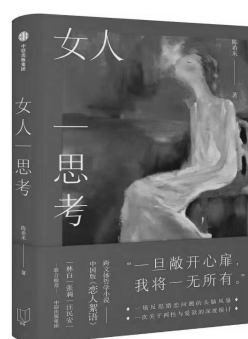
《气候文明史》



(日)田家康 著 范春晓 译 东方出版社 2023年4月版

人类的起源乃至文明的孕育都始于气候变化，作者从亨廷顿的问题意识和兰母的观点出发，展示了塑造人类历史的8万年气候变迁。新版在2010年版基础上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新了一部分结论，并更正了一些错误的说法。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以来频频遭遇特别气候事件、荒漠化加剧、粮食和能源危机，人类开始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反思工业文明，还发现我们对气候的研究和认识都不够充分。中国率先提出生态文明战略转型，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还提出了具体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在这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文明通史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气候、文明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看到了人类文明在气候因素的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脆弱与坚韧。在这一背景下，推出《气候文明史》的新版，不仅契合时代主题，而且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写作风格也会收获一批读者。

《女人一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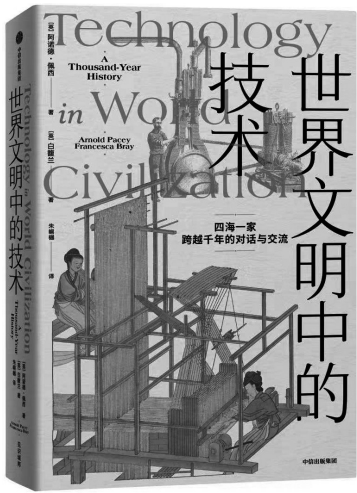


陈希米 著 中信出版社 2023年2月版

这是一本探讨两性关系与爱欲的哲学小说。小说形式新颖，跨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在炽热的爱情叙事与零度的哲学纯思间穿梭越行。作者以女性视角，对爱欲进行了直白、理性、深入、细致的探索，既是一场对两性关系的深度审视和追问，也是反思当代婚恋困境的头脑风暴。（景杉 整理）

以技术发展，丈量世界变化

——关注《世界文明中的技术》新书分享会



白馥兰

张笑宇

阅读提示

近日，中信出版集团特邀《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作者白馥兰、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张笑宇、《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译者朱嗣樾，围绕被誉为现代版“天工开物”，全球技术史里程碑式作品的《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一书，共同探讨技术与文明的相遇和交流。与会学者们深入探讨回答了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以技术对话挑战技术转移等问题。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白晨

近日，中信出版集团特邀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作者白馥兰，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笑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博士生、《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译者朱嗣樾，围绕被誉为现代版“天工开物”，全球技术史里程碑式作品的《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四海一家，跨越千年的对话与交流》一书，共同探讨技术与文明的相遇和交流。与会学者们深入探讨回答了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以技术对话挑战技术转移等问题。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是英国技术史学者阿诺德·佩西于1991年出版的轻学术著作。三十年后，另一名在国际科技史学界享誉已久的英国学者白馥兰受邀与佩西共同对该书进行修订。修订版将论述拉近到21世纪，并且融入了许多近年新取得的研究进展。2021年，英文版问世后，时隔仅一年半中文译本于2023年初问世。全书按编年史的体例将这些技术发展历程

分为12章，围绕着技术对话、环境制约、工业革命三个关键概念展开。概述了自公元1000年起、横跨千年的世界技术发展传播史。本书没有罗列历史上所有的技术创造，而是选取了如农业、火器、印刷、电力、铁路等对文明进步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技术进行阐述，探索了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技术对话。以往，衡量进步的标准是技术革新的速度、创造产出及利润的提升效率；当下，技术对环境的影响成了最主要的问题。因此，本书的最后几章将视角带入更具现实意义的21世纪，从全球视角讨论包括石油化工、航空航天和数字化在内的技术发展，提出需要什么样的新型工业革命来迎接人类世界的挑战。

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就像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样，《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对技术及其重要范畴采取了相当标准的唯物主义观点。白馥兰教授认为，技术是物质制品，是人类为了生产食物、住所、衣服、运输货物、

运送人员、传递信息和思想以及在经济和军事上相互竞争而发展起来的物质实践。这部作品从主流技术史的典型角度来考虑技术，可技术并没有被人们视作一种自主的力量。阿诺德真正想研究的是嵌入技术和技术选择的社会和文化机构。所以不是技术驱动历史，而是历史驱动技术。这本书坚持的核心论点是，不同社会或文明之间的相遇和交流也是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白馥兰教授指出，人们在技术史上往往低估了一些东西。过度强调规模化生产和减少劳动力成本，并将其视为技术进步的标志，是一种狭隘的观点。相反，世界上大多数社会都有不同的劳动风格或投资方式，更密集型、更受技能驱动，非常关注技能本身，反而较少将劳动力作为一个可衡量的类别。然而，这一点在书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张笑宇研究员则认为技术发展意味着一种让我们把事情做对的流程，意味着我们必须热爱真理，并找到一种让它成为现实的方法。历史的理解方式往往被历史学家、思想和观点所影响，导致我们对过去的看法狭隘。我们应该关注历史中那些被忽略的部分，例如经济和技术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当我们改变视角去看人类文明，去看历史，当我们关注技术就会发现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并书写历史。

以技术对话挑战技术转移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是挑战技术转让等固有等级概念的先驱，该书提出需要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技术历史的多重性，将技术的发展置于“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下，展现不同的民族文化如何影响其接受新技术方式。阿诺德使用了“技术对话”这个术语来挑战自上而下的“技术转移”概念，它表明技术传入一地后，通常被调整以适应当地的需求和条件，也常常引发进一步的创新。

在阿诺德进行创作的年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技术转移存在的问题。在西方所谓的先进社会中，即斥巨资进行技术研究的会中，会发

明出先进技术。当时，人们以为将在伦敦或波士顿发明的技术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便可以帮助技术落后地区改善生活。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人们开始尝试技术转移。事与愿违的是，当先进的技术转移到技术落后地区后，却常常收效甚微。大部分人认为如果将先进的技术转移到非洲，但它在那里不起作用，那就是当地非洲文化的错，而不认为是“知识和人工制品可以随处传播”这种固有想法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阿诺德通过对非洲供水领域的观察，发现了其中的逻辑谬误——即技术的转移需要与实际环境相结合。实际上，在非洲当地有着一套自身进行水收集、水分配和水保护的供水系统，他认为这也许不应该完全被西方的水泵、灌溉系统所取代，而是需要进行技术对话，这将有益于这些西方先进技术更好地转移到非洲社会。

面对“技术对话”的话题，白馥兰教授认为，“对话”这个词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对话是平等的交谈，对话理念是双方都有意见，双方的意见都值得倾听。张笑宇研究员则提出，如果技术转移可以被视为一种技术“对话”，那么意味着可以把技术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在理解技术转移时，人们往往会采取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一种是进化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历史进步的体现，没有技术进步就是故步自封。另一种是反殖民主义，认为西方文明总是伴随着某种殖民主义，但技术是好的，我们需要保留好的东西，学习西方好的东西，并打败他们。但这两种状态都不是理解技术与文明之间关系的正确方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越发紧密，技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相互交流与往来间不断革新。《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这本书，从技术的交流、转移角度，审视了千年来全球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出技术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这本书的出版，为我们深入学习技术史，更好地认识技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